

新闻学国家级特色专业教学案例与文选丛书 蒋含平 主编



WAI GUO XIN WEN CHUAN BO SHI ZI LIAO HUI BIAN

外国新闻传播史 资料汇编



刘勇 刘丽◎编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

新闻学国家级特色专业教学案例与文选丛书 蒋含平 主编



WAI GUO XIN WEN CHUAN BO SHI ZI LIAO HUI BIAN

外 国 新 闻 传 播 史 资 料 汇 编



刘 勇 刘 丽◎编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外国新闻传播史资料汇编/刘勇, 刘丽编. —合肥: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7. 12

ISBN 978-7-5650-3734-4

I. ①外… II. ①刘…②刘… III. ①新闻事业史—史料—国外
IV. ①G219.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29351 号

外国新闻传播史资料汇编

刘勇 刘丽 编

责任编辑 朱移山

出版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版次	2017年12月第1版
地址	合肥市屯溪路193号	印次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邮编	230009	开本	710毫米×1010毫米 1/16
电话	总编室: 0551-62903038 市场营销部: 0551-62903198	印张	22
网址	www.hfutpress.com.cn	字数	355千字
E-mail	hfutpress@163.com	印刷	安徽联众印刷有限公司
		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

ISBN 978-7-5650-3734-4

定价: 49.00 元

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

编写说明

《外国新闻传播史文选》是作为本校《简明中外新闻事业史》教材的配套参考资料，供新闻传播学院相关专业的本科生、欲报考新闻传播专业的研究生、对外国新闻传播史感兴趣的读者，学习外国新闻史时使用。

我们在教学中发现，外国新闻传播史因为涉及的时间长、国家多、体例杂，历来是新闻传播类学生学习与考试的一门比较头疼的课程。大多数教材，多在历史的脉络中，把一连串的媒介、事件、人物连缀在一起，使人们很难完整、清晰地把握重要的史实，尤其对于一些在新闻史上有重大意义的典籍只介绍它的地位与贡献，缺乏对其主要内容的介绍。

因此，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需要一本与外国新闻史配套的参考资料，来专门解决这个问题。根据我们的观察，现在国内对中国新闻史出版的配套参考资料较多，而针对外国新闻史出版的配套参考资料比较少，因此编写了本书。

本书体例上包括四个部分，分别是：经典篇、媒介篇、人物篇、事件篇。经典篇所涉内容，都是世界新闻发展史上的重要著作或重点国家的典型媒介中的代表人物（包括了古代、近代与当代）的言论、讲话。媒介篇所介绍的媒体，主要是新闻发展史上以及当代世界范围内有影响力的媒介，内容包括媒介创办、发展、基本结构、重大成就以及著名媒体最新发展情况。人物篇所介绍的人物，都是在新闻发展史上、媒介发展史上或重大报道中有突出贡献与成就的媒体大亨、出版家、新闻记者、主持人等。事件篇所涉事件，均为世界新闻发展史以及各国新闻发展史上比较轰动的事件，都是教材涉及或简略提到而没有深入的事件，依托教材选取资料；突出重点国家：英国、美国；突出传统媒介中的报纸与电视。

本书相对于《简明中外新闻事业史》教材有三点突出的优势：一是教材囿于篇幅所限，所列史实、媒体有限，本书可起到补充作用；二是教材把众多史实、时间、媒介与人物融合在一起，令学生难以清晰把握，本参考资料分门别类，可起到条分缕析的作用；三是教材在对史料的处理上，以客观陈述为主，架构完整，但缺乏血肉，本书则增添了细节、故事性的人物描写，更具可读性，望能调动起同学的兴趣。

这本参考资料，刘勇负责了整体框架的设定、体例的规划，除经典篇外的资料的选取与编写。新闻传播学院教师刘丽负责了经典篇绝大部分资料的选取与编写。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2016 级研究生冉含笑、蔡磊平参与了经典篇、人物篇的部分资料的搜集、整理与编写，并承担了全部的编辑工作。

最后，对本书所引用的各种著作、文献资料的作者，表示衷心感谢。

编者

目 录

经 典 篇

印刷术 14—15 世纪：《美国新闻史——大众传媒解释史》 （节选）	（003）
约翰·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节选）	（007）
密尔的《论自由》（节选）	（010）
约翰·洛克的《政府论》中关于多数人对少数人暴政的思想	（015）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节选）	（018）
托马斯·潘恩的《常识》	（022）
托马斯·杰斐逊关于新闻自由的论述	（029）
美国新闻史上几个棘手问题的重新审视	（031）
法国《人权宣言》	（038）
恩格斯：《马克思和新莱茵报》	（040）
《火星报》编辑部的声明（1990 年 8 月下旬）	（047）
《新闻与揭丑 II：美国黑幕揭发报道先驱林肯·斯蒂芬斯自述》	（051）
《美国新闻史——大众传媒解释史》 （节选）	（058）
语言文字与古代帝国——哈罗德·英尼斯《帝国与传播》 （节选）	（066）
《泰晤士报》《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发展关键时期的相关 总编的论述	（070）

- 《日本的报业理论与实践》(节选) (072)
- 《西方新闻界的竞争》(节选) (078)
- 《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节选) (084)
- 《多种声音 一个世界》 (091)

媒介篇

- 《纽约时报》: 每天设置美国议程的报纸 (097)
- 《华盛顿邮报》: 美国政界必读的报纸 (103)
- 《华尔街日报》: 全球闻名的财经类报纸 (106)
- 《今日美国报》: “麦当劳快餐报” (110)
- 《时代》: 新闻类周刊的开创者 (115)
- 美联社: 世界最大的通讯社 (120)
- CBS: 美式电视新闻的代表 (125)
- 维亚康姆公司 (Viacom) (130)
- 《泰晤士报》(*the Times*) (137)
- 《经济学人》: 全球精英的杂志 (138)
- 《太阳报》(*The Sun*) (143)
- 英国广播公司 (BBC) (148)
- 新闻集团 (News Corporation) (153)
- 《费加罗报》: 法国第一大报 (157)
- 法国电视一台: 法语电视第一频道 (161)
- 法新社: 历史最悠久的通讯社 (166)
- 贝塔斯曼集团 (Bertelsmann AG) (171)
- 卢森堡广播电视公司 (RTL) (174)
- 《读卖新闻》(*Yomiuri Shimbun*) (176)
- 《朝日新闻》(*Asahi Shimbun*) (177)
- 日本广播协会 (Nippon Hoso Kyokai) (180)
- 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 (RAI) (184)
- 俄罗斯第一频道: 俄罗斯电视业的“龙头老大” (186)
- 半岛电视台: 弹丸小国的“国际大台” (190)

人 物 篇

本杰明·富兰克林	(197)
雷蒙·奥克斯	(200)
贝内特	(205)
北岩	(210)
普利策	(214)
李普曼	(218)
亨利·鲁斯	(223)
爱德华·默罗	(228)
沃尔特·克朗凯特	(233)
迈克·华莱士	(238)
凯瑟琳·葛兰姆	(243)
泰德·特纳	(248)
默多克	(251)
罗伯特·卡帕	(256)
彼得·阿内特	(261)
奥琳亚娜·法拉奇	(264)

事 件 篇

曾格案件	(271)
威尔克斯事件	(277)
朱尼斯匿名案	(281)
“黄色新闻”之战	(283)
“掏粪运动”	(286)
“白虹贯日”事件	(291)
巨人军——《读卖新闻》发行的秘密武器	(293)
报纸的民主化运动和编辑权	(297)
“双头垄断”	(300)
《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	(305)
“红狮案”——都是吹牛惹的祸	(314)

与白宫对抗——时报刊载五角大楼文件案件	(319)
“水门事件”	(324)
法勃尔：拒绝透露消息来源	(327)
珍妮特·库克和吉米的世界	(331)
BBC 凯利事件	(334)
无所不在的窃（听）：“窃（听）门”丑闻始末	(338)

经
典
篇

印刷术 14—15 世纪：《美国新闻史——大众传媒解释史》（节选）

印刷术的发展

最先进行采集和发布信息的系统性尝试的当属《每日纪闻》（*Acta Diurna*）——公元前 59 年至公元 222 年间定期张贴在古罗马广场上的手工抄写的“每日公报”。这些报道由已知最早的新闻撰稿人 *actuarii*（拉丁文，原意是“文件登记者”“速记者”——译注）撰写，报道记述的是有关元老院的投票情况和公共事件，再由抄写员誊抄，然后发送到帝国各地。这一开明行动深受罗马人的欢迎，他们可以借此了解到官方法令、法律告示，甚至是最新的决斗结果。在它之前，为了使储存和发布信息更为方便，已经有人做过不少尝试。在大约公元前 3500 年的时候，历史上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发明了一种保存记录的方法：用圆筒印章在湿泥板上滚转以留下记号和符号，然后在太阳底下曝晒，他们还设计了一种楔形文字书写系统，用骨头在湿泥板上刻记号。在这 1000 年以前，用以标志个人所有权的印章就已常见。象形文字和表意文字——人们熟悉的动物、物体和人的图案——在地中海地区、中国、印度和现在是墨西哥和埃及的地方（即所知象形文字的发源地）都已流行。在公元前 1700 年的小亚细亚，就有人发明了一种活字印刷术，这有在克里特岛发现的一只黏土制浅盘为证。这只盘子上有 45 种记号，它们被先刻成单个的字符，然后压印到黏土盘上。

在大约公元前 1500 年的时候，精细石雕和木雕在东地中海地区就已经普及，这个时间与 1000 年前的腓尼基人发明声音符号与字母表的时间大体一致。他们使用有色液体给“字母”描边，从而创造出字母文字。在大约公元前 500 年，古埃及人利用在尼罗河沿岸发现的一种野草制造出莎草纸，书写者因此可以使用毛笔或羽毛笔“书写”象形文字，这种莎草纸可以连接起来

制成纸卷。数百年来，这种纸卷被收藏在学府里。如果说用黏土和石块制成的印版十分沉重，不易储藏或远距离携带，那么用埃及纸莎草制成的纸张和书卷使信息的共享变得简便了。

从大约公元100年开始，皮革被用作为一种书写材料，用动物皮革制成的皮纸被希腊和罗马帝国用来书写特殊手稿和信函。在同一时期，中国人用树浆和纤维发明了一种光洁的白纸，他们还发明了一种方法，把石刻字模蘸上油墨后转印到纸张上。把这些字模排列在一块就可以制出精美的彩色文卷来。

王玠印刷了一本被认为是世界上唯一迄今保存完整的最古老的书（指唐咸通九年雕版印制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现存伦敦大英博物馆——译注），它是在公元868年用木刻版印刷出来的。大块的木刻版可以加以雕刻，这样一张纸在双面印刷后可以被折成32开书本大小的纸页。冯道（882—954，五代十国时后唐、后晋的宰相——译注）在公元932年至953年间印刷了孔子的经典著作。在大约公元1045年时，工匠毕昇受到启发而发明了一套泥活字——可以反复使用的陶制“活字”，这种方法后来也在波斯和埃及得到应用。雕版印刷术由马可·波罗（Marco Polo）于1295年从中国返回后介绍到欧洲，并从14世纪和15世纪开始在欧洲流行。这种印刷术的最著名应用是出版了配有插图的书藉。与此同时，印刷术的革新在亚洲继续进行，1241年在朝鲜，已经有人使用了铜制和青铜制的活字。

欧洲最先发明活字印刷术的人是美因茨和斯特拉斯堡的约翰·古登堡（Johan Gutenberg）。从1450年起，古登堡在他的搭档约翰·福斯特（Johan Fust）的帮助下，使用铅与其他金属的合金浇铸的单个字母，上面的字是用浮雕法雕刻而成的反向文字。很显然，他当时并不知道中国早就已经在使用这种印刷术了。在利用由榨汁机改装的印刷机印刷了数本书籍后，他在1456年开始重印《圣经》。然而，由于无法偿还福斯特的贷款，古登堡在第二年就失去了他的店铺，而福斯特在1460年才完成了《圣经》的印刷。威廉·卡克斯顿（William Caxton）在1476年将第一台印刷机引入英格兰；而到了1490年，每座欧洲大城市至少有一台印刷机在使用。

印刷机作为变革力量

在西欧，印刷机的出现对生活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伊丽莎白·爱森斯坦博士（Dr. Elizabeth Eisenstein）在她所做的研究报告中收集了一些证据来证明她所提出的如下论点：在15世纪末至16世纪，印刷术的扩散撕裂了西

欧的社会生活结构，并用新的方式将它重新组合，从而形成了近现代模式的雏形；印刷材料的使用促成了社会、文化、家庭和工业的变革，从而推动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科学革命。

活字印刷术是如何促使几个世纪来人们既定的思维和习惯发生这样剧烈变革的呢？首先，它降低了文学作品和印刷材料的价格，使大众能够获得它们。用手工制作一本书籍或一封新闻信，成本既是高昂的，又是费力的。其次印刷机不仅降低了单位成本，而且可以批量生产，这意味着知识不再是特权阶级的独有财富。最后，廉价的印刷读物有助于提高识字率，读书识字则可激发一个人的好奇心，道理很简单：一些原本没想到过的事情引起了人们的关注。随着中世纪的终结，许多社会新趋势打破了陈规陋习，开辟了一个讨论的时代。

公元15世纪的所谓原始书籍与它们的前身手抄本十分相似。但是印刷机很快就印刷出了更简便的书籍、小册子和单张印刷品。书籍出版也从大学和修道院扩展到小城镇和村庄。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及其追随者们在1520年之后用印刷品在德意志乡村广泛传播新教教义，它们被广为复制和讨论。由于听众中许多人缺乏必要的文化背景和推理的经历，因此演说者们通常要通过抒发情感来发出有关呼吁。而当人们用感性而不是理性思维作出反应时，有时就会摒弃秩序井然的现状和因行为温驯而产生的安全性，而这两点正是统治中世纪社会的贵族阶层和天主教会的标志。因此，传统的精英集团有充分理由担心印刷界打破常规的诉诸感情的做法所导致的社会后果。有鉴于马丁·路德在德意志推行的以读书为本、以新教为基础的宗教改革取得的成功，亨利八世（Henry VIII）（1491—1547，英格兰国王，1534年经国会确立为英国国教会首脑——译注）很快就采取措施对英格兰的印刷业实施限制。

报纸是印刷机制造的最新奇的产品。随着报纸开始发展出提供新闻和娱乐的功能，它就成了印刷机影响社会和政治变革的主要催化剂。本书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叙述有关这些报纸及其印刷商和撰稿人的故事。然后，本书将叙述印刷媒介与视听和电子媒介的融合，以及他们在当今发挥的传播信息和新闻的重要作用。

早期写作：保存历史

有历史记载的历时最久的信息工程是在中国实施的，因为大约从公元750年开始，中国宫廷就每半年发行一次有关臣民状况的报告，同时还发行月报和皇历。大约从1360年起，这类公报改为每周出版；到了1830年，它们又

成为了每日出版物。被人们称为《京报》的公报一直出版到1911年，另外一种为省级长官印制的出版物是在大约公元950年出现的，它也出版到1911年。

从最初开始，史学家的一个目标就是保存历史。报刊史学家罗伯特·德斯蒙德博士（Dr. Robert W. Desmond）在他出版的4卷本的《世界新闻报道史》鸿篇巨著的开篇里提出，早期的作家们所发挥的作用“与后世的文人和印刷媒介的记者们相类似，他们所写的是自己所处的时代和人物，他们在采集和记录信息”。德斯蒙德将以下归于此列：古希腊诗人荷马（Homer）与他的作品《伊利亚特》（*Iliad*）和《奥德赛》（*Odyssey*）；遍游中东的“历史之父”希罗多德（Herodotus）经常为他人撰写讲稿、类似今日公关专家的雅典人狄摩西尼（Demosthenes）；孔子描述的是自己所处的时代和同时代人物；修昔底德（Thucydides）创作了有关雅典人与斯巴达人战争的8卷史书；朱利叶斯·恺撒（Julius Caesar）在他的《内战记》（*Commentaries*）中报道了罗马人的多场战争；普鲁塔克（Plutarch）撰写了多篇著名领袖人物的“传记”；记载耶稣基督（Jesus Christ）生平的《新约全书》和使徒保罗（Paul）的书信感染了无数的人；《每日纪闻》抄本被公众保存在一座特殊的建筑里，同样有许多经卷保存在各地；由马可·波罗手写的详细记录他两次访问中国、历时33年的书卷，在其后250多年中一直被人们广泛誊抄和传播，在1559年《马可·波罗游记》作为欧洲最早出版的书籍之一正式诞生了。在14世纪初，蒙古史学家拉希德丁（Rashid al-Din）撰写了一部《世界全史》。该书中至少有3卷是以阿拉伯文的形式出现的，记载的是有关成吉思汗、先知穆罕默德、中国史、印度史〔包括佛陀（Buddha）的生活〕、《旧约全书》的历史故事和对蒙古人在13世纪入侵时所遭遇的其他民族的非议。1980年，该书第二卷中配有精美插图的部分手稿在失踪近500年后出现，在伦敦以200万美元的价格售出。

选自：〔美〕迈克尔·埃默里、埃德温·埃默里著，展江、殷文译，《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第八版），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1-5页；参看：《简明中外新闻事业史》283-284页。

约翰·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节选）

节制是多么伟大的美德，在人的一生中又是多么重要啊！但上帝把这样大的事情完全交给了成年人，让他们凭自己的品性做决定，此外并没有提出任何法律或规定。因此，当他在天上亲自为犹太人定律法的时候，每人每天所得的食物是一俄梅珥。这一分量纵使是胃口最好的人吃三天也吃不完。这些“都是入口的而不是出口的，不可能污秽人”。于是上帝便不会把人们永远限制在一切规定好了的幼稚状态之下，而使他自己具有理智来选择。如果对于一向用说服来管理的事物转瞬间增加许多法律和强制规定，那么说教就没有工作可做了。所罗门告诉我们说阅读会使身体疲乏，但不管是他还是其他英明的圣经作者都没有说阅读是不合法的。如果上帝认为限制阅读是有益的，那么他告诉我们阅读那类书籍不合法比告诉我们阅读会使身体疲乏要简单得多。至于受圣·保罗劝导而改奉基督的人焚烧以弗所那些书的问题，答复是那次烧的都是关于幻术的书。这是叙利亚人烧的，是一种平民自发的行为，我们可以自发地加以模仿。那些人在悔恨之中把自己所有的书烧掉了。当地的长官并没有授权办这种事。叙利亚人实行了那些书中的邪术，其他的人如果只是阅读的话，便可能从其中获得益处。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中，善与恶几乎是无法分开的。关于善的知识和关于恶的知识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千万种难以识别的相似之处，甚至连赛克劳碌终生也拣不清的种子都没有这样混乱。在亚当尝的那个苹果的皮上，善与恶的知识就像连在一起的一对孪生子一样跳进世界里来了。也许正是由于这一劫数，亚当才知道有善恶，也就是说从恶里知道有善。因此，就人类目前的情况说来，没有对于恶的知识，我们又有什么智慧可做选择，有什么节制的规矩可以规范自己呢？谁要是能理解并估计到恶的一切习性和表面的快乐，同时又能自制并加以分别而选择真正善的事物，他便是一个真正富于战斗精神的基督徒。如果善是一种隐秘而不能见人的，没有活动，也没有气息，从不敢大胆地站出来和对手见

面，而只是在一场赛跑中偷偷地溜掉，这种善我是不敢恭维的。在这种赛跑中，不流汗、不吃灰决得不到不朽的花冠。的确，我们带到世界上来的不是纯洁，而是污秽。使我们纯化的是考验，而考验则是通过对立物达到的。因此，善在恶的面前如果只是一个出世未久的幼童，只是因为不知道恶诱惑堕落者所允诺的最大好处而抛弃了恶，那便是一种无知的善，而不是一种纯真的善，它的洁白无瑕只是外加的一层白色而已。

.....

应当注意的是我们像这样消除了多少罪恶，就会破坏同样多的美德。因为德与恶本是一体，消除其中之一，便会把另一个也一起消除了。这就证明上帝的至高天意是有理由的，他一方面命令我们节制、公正和自治，但又在我们周围大量撒下令人贪恋的东西，同时又赐给我们一个漫无限制而无法满足的心灵。试问我们又为什么要制定出一套严格的制度，忤逆上帝和自然的意旨，取消那些考验美德和体现真理的东西呢？而书籍如果允许自由出版，就正是这样的东西。我们最好能认识到：法律如果限制了本性无定，并且可以不分轩輊地产生善果与恶果的东西，它本身就必然也是漂浮不定的。如果让我来选择的话，我就宁愿要一点一滴的善行而不要大量强力限制恶行的东西。因为上帝对于一个贤德之人的成长和完整，比对限制十个恶人的问题要关心得多。其实我们的视、听、言、行，都可以说是我们写出的书，其效果和写作是一样的。如果被禁止的仅仅是书籍，那么这一条法令似乎从根本就不能达到本身的目的。我们难道没有看见非议国政的刊物在不断地攻击议会和我们这个城市吗？这还不止是一次两次，而是每星期都有。墨迹未干的刊物就能向我们证明许可证制究竟做了一些什么。然而有人又会认为这就正好证实了这条法令的作用，他们会说：“这就是实行了这个法令。”但肯定地说，假如这项法令对这个特殊事例的作用就是放纵无度和盲目行事，那么今后对其他的书籍又将怎样呢？上议员和下议员们，如果你们想使这条法令不形同具文，那就必须取消和禁止一切未经许可而已经刊印散发的诽谤性书籍。只有在你们把这些书都开列出清单来，人们才能知道哪些是禁止的，哪些是不禁止的。同时还要下令，一切外国书籍，未经审阅不得流传。这样的机关就不是少数几个检查员终日劳碌所能应付得了，而且这种人还不能是一般的庸人。此外还有些书籍是一部分有用而且绝妙，另一部分却有毒而且有害，为了使学术的共和国不受到损害，就必须有更多的官员来加以删改。最后，当他们手中大量书籍不断增加的时候，诸位大概还必须把屡犯不改的印刷商开具名单，禁止他们收进任何可疑的活版。简单地说，如果诸位要使这条法令执行得严格而没有漏洞，那就必须完全根据特利腾宗教会议和西班牙宗教